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基于2007—2019年的县域统计年鉴数据

匡远配, 肖叶

(湖南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 利用经济增长贡献分解模型, 基于2007—2019年的县域统计年鉴数据测度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总体经济增长效应, 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运用脱钩指数模型分析农村三产融合主要动力和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增长效应之间的关联性。结果表明: 农村第一产业贡献一直处于低位水平, 第二产业贡献呈波动中趋于平缓趋势, 第三产业贡献呈波动上升趋势, 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处于较低水平, 波动幅度较大; 农产品加工业、信息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等三产融合的主要动力和产业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 农村三产融合尚未形成有效的经济增长新动能。

关键词: 农村三产融合; 经济增长效应; 关联性; 脱钩指数

中图分类号: F32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2)02-0010-08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Based on the county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from 2007 to 2019

KUANG Yuanpei, XIAO Ye

(School of Economics, Hun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128, China)

Abstract: Adopting the contribution decomposition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this paper measured the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effect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y based on the data of county statistical yearbook from 2007 to 2019. On this basis, the decoupling index model is further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among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economic growth effects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rural primary industry has always been at a low level, that of the secondary industry has tended to be flat in the fluctuation, and that of the tertiary industry has shown a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while the contribution of rural three- industry integr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and fluctuates greatly. And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of the three-industry integration such as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informatization, leisure agriculture and rural tourism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effects brought by these industries are inapparent, and the rural three-industry integration has not yet formed an effective new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economic growth effect; correlation; decoupling index

一、问题的提出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后文简称“三产融

合”)是助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挖掘农业多功能性、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农业农村的创新发展,迫切需要加快农村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早在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要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这是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雏形^[1]。

收稿日期: 2022-01-1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973042, 71473080)

作者简介: 匡远配(1973—),男,湖南武冈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要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2016—2021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拓展农业产业链与提升价值链。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产业兴旺放在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的首位,提出要有效促进农业农村产业发展,充分激活产业发展活力。农村三产融合是以农业为基本依托,通过延伸产业链、集聚要素、技术渗透、创新组织制度等方式,对资本、技术与资源要素进行跨界集约配置,使农业产加销、休闲以及其他服务业有机整合在一起,进而推动农村三次产业协同发展和农业竞争力的提升,实现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2]。其实质是农村产业一体化,是农业产业化的高级形态和升级版,关键和核心是融合,根本目的是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农民福祉,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3]。

目前,关于产业融合效应的研究主要从产业结构、产业间的资源配置和空间重构、“四新”(指新业态、新产业、新技术和新模式)等来解读产业融合发展的益处。例如,产业融合是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产业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代表着产业边界的模糊化、资源要素配置的有效化、经济服务化趋势,目的是建立产业间新型竞争协同关系和产生更大的复合经济效应^[4]。基于经济增长视角,有研究认为,产业深度融合会推动经济增长,把农业纳入经济增长的分工中^[5],能从更宽广的平台中汲取经济增长的成果。农村三产融合效应的研究主要有两条线:一条是从宏观层面关注农村三产融合对经济增长、结构调整、改革红利等方面产生的影响;一条是从微观视角着眼于其对农民增收、就业和农业主体培育等价值功能实现的影响。在宏观方面,农村三产融合能够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和结构红利,以及提升农业竞争力,有助于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提升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6],实现县域范围内三次产业关系的优化集成和空间重构,将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会越来越频繁和便利,有利于优化经济增长中的资源配置,挖掘结构红利,发挥技术进步贡献,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7]。因此,只有实现农村产业深度融合,才能推进农业现

代化,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微观方面,三产融合发展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8]。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三产融合的重要载体^[9],主导各种经营主体从事三产融合发展,可以推动各种资源和要素融合,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带动农民就业与增收。发挥农业多功能性、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效益是农村产业融合的重要基础^[10]。

综合来看,目前很多学者通过构建农村三产融合指标体系,测算区域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指数^[10,11]。如从产出高效化、业态多样化、服务社会化、生态绿色化、城乡一体化五方面构建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测度分析北京市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与区域分布特征^[12]。也有学者基于微观主体视角,实证检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融合型产业的影响因素^[13],或从农户参与三产融合的增收效应来评估三产融合的发展效果^[14]。然而,基于县域视角,定量测度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献相对缺乏。中央 2015 年《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引导农村二三产业向县城集中,完善县域产业空间布局和功能定位,并以县(市、区)为基础,搭建农村综合性服务平台。县域作为农村三产融合的重要发展空间,能有效延伸产业链、丰富产业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增强农村活力。如何在乡村振兴和产业结构变革加速的背景下,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农村三产融合持续健康发展,是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的重点。为此,笔者拟基于 2007—2019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数据,运用产业结构理论将农村三产融合与经济增长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思考,利用经济增长贡献分解模型测度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总体经济增长效应,并进一步运用脱钩指数模型分析农村三产融合主要动力和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增长效应背后的关联性。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农业农村高效高质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与现实价值。

二、研究设计

1. 基于结构变化的经济增长贡献分解模型

在一般均衡理论中,经济增长不仅来源于总量投入的增加,而且有结构变化带来的贡献,结构变

化特指生产要素从低边际报酬部门向高边际报酬部门的转移^[15]。同时,根据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某一产业部门的价值增值是由产业价值链上不同环节所增值的部分构成,价值增值环节越多增值总额也会越大。因此,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在三次产业之间的流动与重新配置,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源泉^[16]。一般情况下,一种要素在一个部门的边际报酬较高也意味着该要素在这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即平均产出)也较高,产业结构变化将要素引入边际报酬较高的行业从而产生经济增长效应^[17]。农村三产融合引致要素组合优化,产业结构发生聚变,农业农村的新业态、新产业、新技术和新模式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理论上,农村三产融合导致产业结构变化将会带来产业融合红利、改革红利和经济效益。基于此,本研究参考姚洋^[17]提出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模型,通过三部门(三次产业)变异的索罗模型^[18],构建农村三产融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模型。模型中人均产出的增长分别扣除三次产业各自的“独立贡献”,剩余的就是三次产业融合的贡献。这样,可以从人均产出中分解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贡献,即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总体经济增长效应。经济增长贡献分解模型具体如下:

假设第一产业为部门1,第二产业为部门2,第三产业为部门3。部门1的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为 Y_1 ,部门2为 Y_2 ,部门3为 Y_3 ,全国总从业人员为 L ,即 $L = L_1 + L_2 + L_3$ 。且 $\mu_i = L_i/L$,即第一产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为 μ_1 ,第二产业的比重为 μ_2 ,第三产业的比重为 $1 - \mu_1 - \mu_2$,即 μ_3 。因此,全国人均产出为:

$$Y = Y_1 \cdot \mu_1 + Y_2 \cdot \mu_2 + Y_3 \cdot \mu_3 \quad (1)$$

即 Y 为三部门人均产出的加权平均。式(1)两边对时间 t 求导得:

$$\begin{aligned} \frac{dY}{dt} &= \frac{dY_1}{dt} \cdot \mu_1 + Y_1 \cdot \frac{d\mu_1}{dt} + \frac{dY_2}{dt} \cdot \mu_2 + \\ &Y_2 \cdot \frac{d\mu_2}{dt} + \frac{dY_3}{dt} \cdot (1 - \mu_1 - \mu_2) - \\ &Y_3 \cdot \frac{d\mu_1}{dt} - Y_3 \cdot \frac{d\mu_2}{dt} \end{aligned} \quad (2)$$

令 $\dot{Y} = \frac{dY}{dt}$,表示本期比上一期的增长量,整理得到:

$$\dot{Y} = \dot{Y}_1 \cdot \mu_1 + \dot{Y}_2 \cdot \mu_2 + \dot{Y}_3 \cdot (1 - \mu_1 - \mu_2) + (Y_1 - Y_3) \cdot \dot{\mu}_1 + (Y_2 - Y_3) \cdot \dot{\mu}_2 \quad (3)$$

式(3)表示全国人均产出增长是三次产业增长的加权平均,再加上三产融合发展引致的增长。两边同除以 Y ,整理得:

$$\frac{\dot{Y}}{Y} = \frac{\dot{Y}_1}{Y_1} \cdot \frac{Y_1 L_1}{YL} + \frac{\dot{Y}_2}{Y_2} \cdot \frac{Y_2 L_2}{YL} + \frac{\dot{Y}_3}{Y_3} \cdot \frac{Y_3 L_3}{YL} + \frac{(Y_1 - Y_3) \cdot \dot{\mu}_1}{Y} + \frac{(Y_2 - Y_3) \cdot \dot{\mu}_2}{Y} \quad (4)$$

式(4)中, $\frac{Y_1 L_1}{YL}$ 为第一产业GDP占全国GDP的比重,记为 s_1 ,同样的, $\frac{Y_2 L_2}{YL}$ 记为 s_2 , $\frac{Y_3 L_3}{YL}$ 记为 s_3 。再令 $\hat{Y} = \frac{\dot{Y}}{Y}$,即全国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可得:

$$\hat{Y} = \hat{Y}_1 \cdot s_1 + \hat{Y}_2 \cdot s_2 + \hat{Y}_3 \cdot (1 - s_1 - s_2) + \frac{(Y_1 - Y_3) \cdot \dot{\mu}_1}{Y} + \frac{(Y_2 - Y_3) \cdot \dot{\mu}_2}{Y} \quad (5)$$

其中, $\left(\frac{(Y_1 - Y_3) \cdot \dot{\mu}_1}{Y} + \frac{(Y_2 - Y_3) \cdot \dot{\mu}_2}{Y}\right)$ 部分即为三产融合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

从式(5)可以看出,三部门人均产出的加权平均不是表达人均产出的全部, $\left(\frac{(Y_1 - Y_3) \cdot \dot{\mu}_1}{Y} + \frac{(Y_2 - Y_3) \cdot \dot{\mu}_2}{Y}\right)$ 部分也是解释人均产出增长的原因,也就是该模型能够评价三产融合发展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原因。该式表示人均产出除了三部门的贡献外,还有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对人均产出增长的贡献,对解释三产融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效的。各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hat{Y}_i \cdot s_i) / \hat{Y}$ 。由此,可以测算出县域经济发展中三次产业及三产融合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 脱钩指数模型

Tapio在研究欧盟15国CO₂排放、交通容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弹性关系时提出脱钩指数模型,用来进行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响应关系的研究,后逐步被应用到农业政策发展和环境经济的研究中^[19-21]。目前,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新动力和产业主要有农产品加工业、农村信息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22]。为进一步分析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增长效应之间的内在联系,本研究引入Tapio的脱钩指数模型从这三方面进行研究。

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农业延长产业链和激发服务业的纽带,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典型性^[23];农村信息化主要体现在农村互联网发展水平,已成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24],农村固定宽带普及率和移动网络覆盖率直接关系到互联网与农业的融合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此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对第一和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牵动和促动效应,已逐步成为驱动三产融合发展的代表性产业^[25]。因

此,本研究从农工融合、农商融合、农旅融合三方面考虑,分别选取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农村网民规模数量、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营业收入作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考察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内在联系。本研究借鉴 Tapio^[20]对脱钩指数的定义可以得出,在给定某个时期 n 内,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 (FC) 与其经济增长效应 (RC) 的脱钩弹性系数 β 的计算方法如公式 (6) 所示,8 种脱钩状态如图 1 所示。其中强脱钩是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增长、而发展水平降低的状态,强负脱钩则是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降低、而发展水平增长的状态,均为二者的畸形链接状态,扩张负脱钩、扩张连接、

弱脱钩表现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增长效应均有增长,但增长速度不同,是相对乐观的状态。

$$\beta_{i,n+1}^t = \frac{(FC_{i,n+1}-FC_{i,n})/FC_n}{(RC_{n+1}-RC_n)/RC_n} \quad (6)$$

在式 (6) 中, i 为第 i 个发展水平 ($i=1,2,3$), n 为第 n 年; $\beta_{i,n+1}$ 为第 $n+1$ 个年份 i 发展水平的脱钩弹性系数; RC_{n+1} 为第 $n+1$ 个年份农村三产融合的经济增长效应; RC_n 为第 n 个年份农村三产融合的经济增长效应, $FC_{i,n+1}$ 为第 $n+1$ 个年份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水平; $FC_{i,n}$ 为第 n 个年份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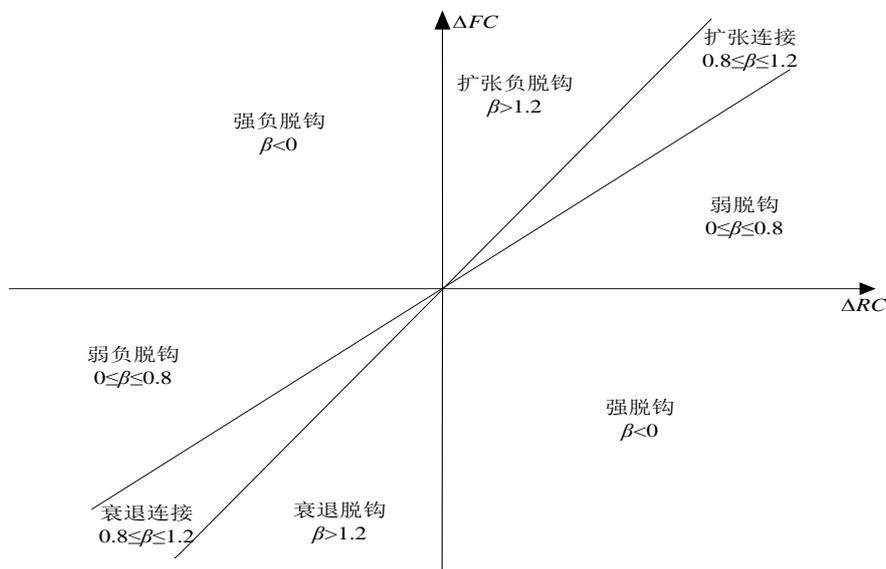


图 1 脱钩指数坐标图

3.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 2007—2019 年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县域三次产业产值及从业人员数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与各省《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来源于《中国农产品加工年鉴》以及农业农村部网站数据,农村网民规模数量来源于 CNNIC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营业收入来自《中国农业年鉴》。其中缺失的个别县(市)数据以相邻年份数据为基础,采用移动平均法进行补全。

三、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1.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总体经济增长效应

2007—2019 年人均产出增长率可以分为两个

阶段来看。第一阶段 2007—2012 年,人均产出增长率趋势平缓,平均增速为 23.46%,属于高增长平稳期。第二阶段 2013—2019 年,人均产出增长率波动较大,主要在低增长率水平呈现缓中趋稳、稳中有进态势,属于波动调整期。中国自 2013 年进入经济新常态后,人均产出增长率表面上看增速放缓,其实质是宏观经济背景下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和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如 2013 年表面上人均产出增长率为负,而实质上就业人数却大幅增加,比上年增长 47.14%,利于充分就业。下面将在分别阐释县域三大产业独立贡献的基础上,对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总体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分析。

(1) 第一产业本身的体量与其贡献是一致的。即第一产业增加值在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变动与

其对产出增长率贡献份额趋势基本一致。2007—2019年,第一产业对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贡献一直处于低位,波动幅度较小,且呈逐年下降趋势,平均年增长率仅1.40%。因为第一产业在经济体量中占比较低,2019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7.11%。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加快,这种比重下降的趋势是农业“小部门化”的典型特征和表现,且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但是,农业的基础性地位没有变,

也不能动摇。农业是农村三产融合的基础,直接关系到产业融合空间的拓展^[26]。而农业中不变的生产要素可塑能力弱,农业“精耕细作”有其自然的极限,“过密化”和“内卷化”显著,一直处于生产效率低下的状态^[27],使得农业在国民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下降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引发农业边缘化的问题。

表1 2007—2019年农村三产融合的经济增长贡献

年份	人均产出增长率	第一产业经济增长贡献	第二产业经济增长贡献	第三产业经济增长贡献	农村三产融合的经济增长贡献
2007	28.585	2.769	31.932	-3.757	-2.359
2008	20.285	2.409	11.350	6.034	0.492
2009	21.403	1.649	3.580	4.756	11.419
2010	22.324	2.141	5.413	3.101	11.669
2011	28.081	2.375	9.589	7.795	8.321
2012	20.079	1.600	8.397	9.585	0.497
2013	-22.527	1.397	-28.785	-24.200	29.060
2014	4.373	1.044	-1.784	0.732	4.381
2015	7.604	0.898	0.576	2.755	3.376
2016	7.014	0.561	1.935	4.143	0.374
2017	5.221	0.021	0.623	0.630	3.947
2018	10.053	0.487	2.867	3.960	2.739
2019	-13.473	0.799	-8.892	-4.117	-1.262

(2)第二产业的地位是稳固的。其经济增长贡献表现为在波动中趋于平缓,且其趋势线与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趋势线几乎一致,表明第二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对拉动经济增长有重要贡献。同样的,可以将第二产业经济增长贡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7—2012年,其经济增长贡献呈“L”型,平均增速11.71%,属于过渡平稳期。第二阶段2013—2019年,其经济增长贡献波动较大,且处于低位水平,属于波动调整期。显然,一国的工业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人均产出达到一定水平后,工业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快速发展期,但一个时期过后增速会适度回调,直至达到一个稳定发展的正常态^[28]。第二产业作为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有其特定的产业属性,当前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市场竞争剧烈等的负外部性带来第二产业效率损失问题^[29],也会抑制其经济增长效应。同时,目前中国农产品加工率仅有55%,低于发达国家80%的水平,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滞后^[23],过剩产能对第二产业的经济增长效应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3)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作用越来越大。其经济增长贡献在波动中上升,其趋势线与人均产出增长率的趋势线大致相同。其变化趋势可分为:第一阶段2007—2012年,第三产业经济增长贡献处于平缓上升期;第二阶段2013—2019年,其经济增长贡献与人均产出增长率、第二产业经济增长贡献趋势一致,且高于第二产业经济增长贡献,呈波动中平缓上升态势,这表明从产业结构层面看,第三产业正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换挡期和结构调整期,经济增长逐步从工业扩张转向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对服务业要求的不断拓宽和提高,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生产技术、市场咨询、金融服务等支持力。今后应推动市场和政府不断创新第三产业的业态模式、管理方式和组织结构等,不断完善包括农村在内的县域市场机制,优化产业结构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4)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总体经济增长贡献还处于较低水平,其平均贡献率仅为5.59%,且波

动幅度较大,呈现出“M”型连续变化趋势。近年来,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呈现出多模式推进、多主体参与、多利益联结、多要素发力、多业态打造的新格局。但现阶段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缺乏深度、引擎不足,产业融合空间拓展不足,农业产业链的增值潜力尚未有效挖掘,工业发展的规模效应和第三产业对信息化的高需求是农村三产深度融合的“高门槛”^[26],这可能是其经济增长贡献处于低位的主要原因。其次,其经济增长贡献在 2007 年和 2019 年呈现负值,主要原因可能受宏观经济大环境影响,对农产品加工业、农林牧副渔服务业等带来很大的

冲击,尤其是“三农”中小微企业存在较大的生存与发展压力。

2.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关联性

本研究采用 Tapio 脱钩指数模型,得到 2007—2019 年农村三产融合主要动力和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增长效应的脱钩指数。从本质上来说,脱钩指数刻画的是在样本年间农村三产融合主要动力和产业的发展水平变化时,其经济增长效应与之呈现的动态链接状态。具体结果见表 2。

表 2 2007—2019 年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增长效应的动态链接

年份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		农村互联网发展水平		休闲农业发展水平	
	脱钩弹性系数 β_1	脱钩状态	脱钩弹性系数 β_2	脱钩状态	脱钩弹性系数 β_3	脱钩状态
2007	—	—	—	—	—	—
2008	-0.159	强负脱钩	-0.417	强负脱钩	-1.348	强负脱钩
2009	0.003	弱脱钩	0.012	弱脱钩	0.019	弱脱钩
2010	10.174	扩张负脱钩	7.708	扩张负脱钩	22.833	扩张负脱钩
2011	-0.628	强负脱钩	-0.306	强负脱钩	-2.788	强负脱钩
2012	-0.153	强负脱钩	-0.156	强负脱钩	-0.118	强负脱钩
2013	0.006	弱脱钩	0.002	弱脱钩	0.003	弱脱钩
2014	-0.462	强负脱钩	-0.007	强负脱钩	-0.168	强负脱钩
2015	-0.211	强负脱钩	-0.416	强负脱钩	-1.634	强负脱钩
2016	-0.054	强负脱钩	-0.035	强负脱钩	-0.332	强负脱钩
2017	-0.005	强脱钩	0.004	弱脱钩	0.031	弱脱钩
2018	0.755	弱负脱钩	-0.203	强负脱钩	-0.265	强负脱钩
2019	0.010	弱负脱钩	-0.077	强负脱钩	-0.043	强负脱钩

总体而言,从 2008—2019 年全时段来看,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增长效应之间呈现出 5 种链接类型,即强负脱钩、弱负脱钩、弱脱钩、强脱钩、扩张负脱钩。农产品加工业、农村信息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与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的链接状态呈动态变化态势,且多数年份处于“强负脱钩”状态,即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的变化量呈增长趋势,而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的变化量呈递减趋势,表明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水平未能有效链接其经济增长效应。可见,近年来作为农村三产融合主要动力和产业的农产品加工业、农业农村信息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虽取得长足进展,且农工、农商、农旅融合的发展水平都在提高,但是仍然没有显著带来农村三产融合的经济增长效应,形势不容乐观。因此,通过脱钩指数模型进行分析得出,目前农村三产融合的

发展尚未形成有效的新动力和新动能。

(1) 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与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的关联性。从脱钩弹性系数看,二者的链接状态呈现出倒“V”型变化趋势,在 2010 年出现转折点,也即“扩张负脱钩”,表明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是二者较为理想的状态。从链接状态看,二者在 2008—2019 年经历了强负脱钩—弱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负脱钩—强负脱钩—弱脱钩—强负脱钩—强负脱钩—强负脱钩—强脱钩—弱负脱钩—弱负脱钩的动态变化过程。其中“强负脱钩”占统计期数的 50%,即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在减少,说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没有带来有效的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与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处于较为理想状态的

统计年期数仅占 25%。原因主要在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质量不高,尽管农产品加工业总体上呈稳步回升趋势,但农产品加工业精深加工能力不足;龙头企业等研发资金不足,辐射带动力有限,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发育迟缓,规模化、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30];环保和排污等基础设施投入成本较高、融资难等问题的存在,都极大地制约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使其难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并阻碍三产联通及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效益。

(2) 农村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的关联性。从脱钩弹性系数看,其变化趋势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水平的弹性系数大致相同,也呈倒“V”型,在 2010 年脱钩弹性系数为 7.708,表明农村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增长快于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是二者较为理想的状态。从链接状态看,2008—2109 年经历了强负脱钩—弱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负脱钩—强负脱钩—弱脱钩—强负脱钩—强负脱钩—强负脱钩—弱脱钩—强负脱钩—强负脱钩的动态变化过程,其中“强负脱钩”占统计期数的 66.67%,即大多数年份农村互联网发展水平呈增长趋势,而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在减少,表明农村互联网发展水平没有有效提升农村三产融合的经济增长效应。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不足:中国独特的地形特征及人口分布特点致使农村网络覆盖率较低,网速慢、专线难用等问题突出^[24],与外界的信息化鸿沟日趋扩大。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5.9%,农村网民规模达 3.09 亿人。目前,许多农村地区从互联网基础到产业基础、交通物流,再到市场运营、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存在短板,呈现出整体性落后局面。“互联网+农业”的概念和想法很多,但真正落地的项目却寥寥无几。“互联网+”基础设施和装备支撑能力不足,阻碍了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升级,影响农村三产融合的经济效益。

(3)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与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的关联性。从弹性系数看,与前二者类似地呈现倒“V”型发展趋势,2010 年弹性系数为 22.833,即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增速快于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是二者较为理想的状态。从链接状态看,2008—2109 年

经历了强负脱钩—弱脱钩—扩张负脱钩—强负脱钩—强负脱钩—弱脱钩—强负脱钩—强负脱钩—强负脱钩—弱脱钩—强负脱钩—强负脱钩—强负脱钩动态变化的过程,其中“强负脱钩”占统计期数的 66.67%,对应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与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处于较为理想状态的统计年期数仅占 33.33%。即大多数年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水平呈增长趋势,而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在减少,表明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并没有有效提升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这主要由于目前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市场竞争力不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作为扎根于农业农村的融合型产业,它的发展壮大不可避免地受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制约,经营模式同质化、专业人才短缺、资源约束增强、体制机制不畅等问题一直存在^[25]。农村旅游发展多呈现产业模式混乱、规模小等现象,尤其在建设环节机会主义行为和功利性色彩过重,损害了农村三产融合的利益联结机制。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经营方向亟须由“产品经济”转向“服务经济”,通过发展差异化与优质化农业来提升其竞争力,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以有效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 2007—2019 年县域统计年鉴数据,本研究在利用经济增长贡献分解模型,测度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总体经济增长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脱钩指数模型分析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增长效应之间的关联性。测算结果表明,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处于低位水平;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波动中趋于平缓趋势,在经济发展中仍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波动上升趋势,正逐步成为产业主体;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总体经济增长贡献还处于较低水平,波动幅度较大,经济增长效应不明显。进一步运用脱钩指数,从农产品加工业、农村信息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等主要动力与产业入手,分析其与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背后的关联性,发现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未能有效带来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主要原因在于要素流动不足、市场竞争力不强;农村三产融合的技术支撑不足,

金融服务能力不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不足，难以带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农村三产融合的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突出问题，尚未能有效服务农村三产融合发展，阻碍了农村三产融合经济增长效应。

为进一步改进农村三产融合的经济增长效应，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打破要素流动壁垒，推动农村三产深度融合。实现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合理充分双向流动，推动实现农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关键要素合理充分流动。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二产为支撑，三产为主攻方向”的原则，加快延伸农业产业链、整合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实现利润链，实现三次产业关系在农村优化组合和空间重构。依赖本地资源特色创新休闲农业旅游模式，实现农旅交叉渗透融合，推动产业融合和联动发展。加快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实践新技术、培育新动能、探索新模式，着力提升农村市场竞争力，推动三产深度融合。第二，以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和优化市场“多轮驱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以科技作为农村发展的持续推动力，加大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力度，提高资源投入效率，实现由劳动、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路径转变。提供完备的财政支农、信贷担保、金融支持、税费减免等政策支持，形成适应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特点和需求的金融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多依靠新型农村经营主体选择农村三产融合的具体路径，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第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双管齐下”提升农村三产融合能力。多层面多渠道培育职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农业经营者队伍，提升整体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农村三产融合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引导农产品加工等相关产业适度集中、集聚、集群融合，进一步释放科技进步的溢出效应。创新和完善多元化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与政策落实机制。创新服务内容和方式，增强供给服务的能力，有效对接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多样化服务需求。第四，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多渠道提高农民收入。打造多农业经营主体协调发展、互利共赢的农业产

业化联合体，建立农民参与分享、等价交换的利益分配机制，创新互利共赢与风险共担机制，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与农户共同发展。搭建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平台，拓宽产业融合渠道，鼓励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户参与农村三产融合。支持农户以多种形式加入到非农产业，并从中获得相应的要素收益。将与农业产业链相关的二三产业的就业留在农村、增值收益留在农村。

参考文献：

- [1] 蒋永穆. 中国农村改革四十年：回顾与经验[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356.
- [2] 马晓河.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N]. 农民日报，2015-02-10(001).
- [3] 肖卫东，杜志雄.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内涵要解、发展现状与未来思路[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6)：120-129.
- [4] 周振华. 产业融合拓展化的过程及其基本含义[J]. 社会科学，2004(5)：5-12.
- [5] 苏毅清，游玉婷，王志刚.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 中国软科学，2016(8)：17-28.
- [6] 余欣荣.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蓝图、总路线图——解读《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J]. 农村经营管理，2018(10)：7-13.
- [7] 王振华. 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县域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D]. 沈阳：沈阳农业大学，2014.
- [8] 张义博. 农业现代化视野的产业融合互动及其路径找寻[J]. 改革，2015(2)：98-107.
- [9] 叶兴庆.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须牢记初心[N]. 经济日报，2017-04-10(011).
- [10] 向从武. 四川省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及空间分异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8)：226-233.
- [11] 陈盛伟，冯叶. 基于熵值法和 TOPSIS 法的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综合评价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J] 东岳论丛，2020，41(5)：78-86.
- [12] 李治，王一杰，胡志全.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评价体系的构建与评价——以北京市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9，40(11)：111-120.
- [13] 杨久栋，马彪，彭超.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融合型产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J]. 农业技术经济，2019(9)：105-113.
- [14] 李姣媛，覃诚，方向明.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农户参与及其增收效应研究[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0(5)：103-116.

(下转第 91 页)